

On the Cusp between Wei and Jin
Power and Networks during the Transition (249-306A.D)

魏晋之际的 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仇鹿鸣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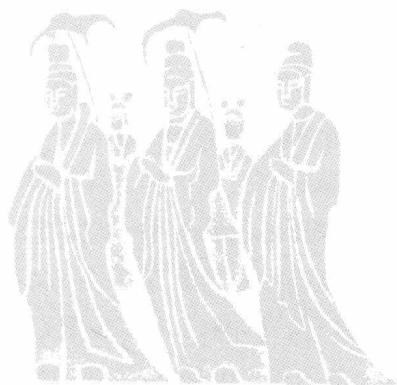
魏晋之际的 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仇鹿鸣 著

On the Cusp between Wei and Jin

Power and Networks during the Transition (249-300A.D)

Qiu Luming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 仇鹿鸣著.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325-7615-9

I. ①魏… II. ①仇…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3064 号

ISBN 978-7-5325-7615-9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仇鹿鸣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苏州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21.75 插页 5 字数 300,000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5-7615-9

K · 2032 定价: 7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序

韩 昇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中，短暂王朝的历史往往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容易轻易地下个结论，以偏概全，或者一笔带过。典型的如秦朝，大家都津津乐道其统一的伟业，书同文，车同轨，而不注意揭示从封建制到郡县制转变的过程，及其对汉朝崛起的影响，秦始皇的暴政必须从这个过程中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至于“汉承秦制”的通论，更是流于表象，后起的王朝总是以前朝为镜鉴的，汉朝的治国理念反秦之道而行之，所承之制背后的灵魂截然不同。同样的情况在隋唐之际再次重演，没有从国家意识形态崩溃、民族对立、急功近利的唯权力论横行而造成的国家机器和基层社会的分崩离析去考察重新统一趋势的形成过程，就无法领悟隋唐两代的起承转合，兴替跌宕。因此，所谓“唐承隋制”，犹如看到唐朝开的是和隋朝同一个品牌的车子，就认为他们是一回事，而且因为开车的司机曾经相识，就指认他们是同伙，属于“关陇集团”。其实，刘邦和李世民远比世人理解的高明得多，他们看到前朝打造了一部好车，所以都继承了过来。但是，他们看到问题不在于车子，而在于开车的人，因为开车去撞人，最后被愤怒的人群掀翻了，所以他们接过这部车子，载上人群去赶路，去让大家享受坐车的快乐。你能说前后的司机是同伙吗？为什么我们的眼光总是停留在那部车子上面，投去羡慕的眼光和啧啧的赞叹，而罔顾行车精神和目的的质变，难道唯有物才是历史评论者的史观吗？

秦和隋还算是好的，毕竟是统一进程中的短命王朝，至于西晋史的研究就更加难以与之相提并论了，因为它属于分裂过程中夭折的王朝，从西晋平吴实现统一起算，这个王朝也就维持了三十七年，其中十六年还在

“八王之乱”的兵燹中度过，如此短命的统一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所以，在历史叙述中往往被一笔带过，或者简单概括为奢靡、贪婪、白痴和政治上的不思进取，清谈误国。对历史作简单草率的处理，或者带着预先设定的观点以及强烈的价值判断去观察，就无法揭示历史真相，更不能对于后人有所启发。

实际上，西晋的统治者并非不思进取、无所作为。从司马懿以至西晋武帝，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那就是推崇“孝”，以孝入法，以孝治天下，企图打造出一个君臣父子秩序井然的社会，一个有道德的文明时代。这一点不应该一笔抹煞，斥之为虚伪，也不能简单地用政治派别来区分思想，诸如法家崇尚简朴法制，儒家热衷奢靡人治等等，虚构一幅党派线条清晰却是人造的魏晋历史图画来。

西晋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政治人事问题，司马氏继承的是曹魏的人马和传统，如何转变到西晋自己的政治路线上来，这个问题司马氏一直没有处理好。第二个问题更重要，那就是如何树立适应当世、引领思潮的文化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司马氏做得更差。

东汉不亡于黄巾民变，而亡于清流官僚，其背后是“党锢之祸”以后汉代统治思想彻底崩溃，造成整个有历史使命感的清流阶层的信仰崩溃，于是反统治意识形态的各种思潮纷纷兴起，思想之混乱，莫此为甚。一方面当然可以称之为思想大解放。但是，这个大解放是在漫无目标、没有基本方向下的漂流，四顾茫然，乡关何在？道德一再被摒弃，人心不能凝聚，反映在政治现实上就是各地豪杰拥兵自重，相互征伐。以前的历史著作称他们为新军阀，恐怕不妥。割据一地者多为清流领袖，或有志于澄清天下的新秀，但是，他们在政治上互相不服，在思想上谁也提不出一套能够为多数人信服的新道德、新理论来。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等人只能做到相对的政治清明，但是，传统法家的政治权术不足于构成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的道德又被东汉的腐败政治现实污名化，被斥为虚伪而弃之如敝屣。司马氏出身于传统儒学大家，他试图用大家族伦理中的“孝”来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然而这种观念已经落伍，我们应该注意到东汉末期流传的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才怯如鸡”，透

露出对于“孝道”反人性与虚伪性的批判。在社会动荡时代，大家族制度首当其冲，山谷陵替，旧族衰落，新人云起，想用已经破产的宗法绳索去驯服新的时代，当然不会成功，而且更因为西晋皇室内部的血腥争斗而令旧道德彻底失去人心，导致了西晋以后社会彻底的瓦解。

西晋的失败，应该放在东汉以来政治社会与国家意识形态大崩溃的背景下来认识。魏晋之际错综复杂的政治人事关系，以及统治者面对高昂激化的舆论时应对失措，无能、不作为和用错药，变成恶性循环，加剧社会迅速断裂为碎片，“八王之乱”又勾引胡族参加到争权夺利的内讧中来，政治破产、信仰崩溃加上民族斗争，从而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分裂时代。西晋是这个大崩溃时代的庸医，非但没能救世，反而用老处方给气息奄奄的病人开了一剂毒药。

短暂的王朝容易被人忽视，但它处于历史转折点上，是不可跨越的桥梁，其内容和启示意义丰富而深刻，成为后来者的镜鉴。许多强盛王朝的制度和做法，其源头往往都能追溯到前一个短暂王朝，这样的事例很多。将这些朝代的历史一笔带过，整个历史过程就被打断，甚至被碎片化。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不是结果，而是事物是如何形成的，只有对过程有全面而准确的把握，才能对既成事实有深刻的理解，进而对未来的趋势有所展望。

真正对历史有深刻感悟的人，从来都重视短暂王朝的研究。唐太宗以史为鉴，特别注重对隋朝的剖析。人们会说那是以前朝为鉴，历代皆然。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唐太宗也特别重视晋史，甚至为《晋书》执笔撰文，此即可见一斑。

当然，做短暂王朝史的研究，难度更大。就魏晋史而言，既要有大视野，要看得清时局大势，又要有足够的观察力，能够在混乱的政治人事关系中，循着蛛丝马迹将历史真相钩沉揭示。而且，这段历史的研究，积累非常丰厚，从近代历史学在中国确立以来，魏晋史研究就不断取得进展，从文献整理、历史考证到史事评论、理论辨析，无不硕果累累。在日本，魏晋史也一直处于研究前沿，其中国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中，魏晋史论著占有相当的比重。对于后来研究者而言，在这片园地开垦是非常好的锻炼，

既要善于把握宏观与微观的平衡,又要善于继承和创新。史料记载不足,是做魏晋史研究的薄弱之处,需要研究者有很好的历史领悟力,其观点可以展示作者认识的境界。研究积累丰厚似乎是个优势,然而,以往的学说也包含着研究者的主观判断,甚至是误解,不能批判性地继承,就可能成为包袱甚至是障碍。

仇鹿鸣博士从大学本科时就选择了魏晋南北朝史为研究方向,一直坚持不懈,他像一位优秀的长跑运动员,每天清晨,都能看到他端坐于书桌前静静读书,从不间断。时代风云往往在他胸中激荡,卷起思绪万千,评鹭论说,慷慨激昂。近年来,书越读越多,史料辨析与阅历倍增,更显静气,思考周详,论证缜密,洞察愈深。这本书是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专著,对于魏晋之际的政治关系有相当深入的辨析考订,往往有出人意表的新见,且言之有据,成一家之言。我读过此书多遍,所以敢说这本书一定是研究魏晋史必须一读的著作,相信大家读了以后也会有同感。

这本书好在哪里呢?我不想在这里做书评,只说一点,那就是对魏晋之际的政治过程有细腻而深入的分析,对于错综复杂的政治人事关系做了梳理,让读者能够在政治过程的细微之处,看清楚事件的原貌,力图还原出真相来。一旦将这些问题辨析清楚了,作者对于这些问题的提炼及评说,会让人领略到以往未曾想到的新的魏晋史,不禁发出原来如此的感叹,同时又在感叹中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到达一个新的高度。

一本好的历史著作,一定是对历史进程的详实把握,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同时又是对此过程有一个批判性的理论思考,给人回味无穷。这是历史与研究者的呼应,也是研究者与读者的互动。我们都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而每一位研究者的成果都会带给我们启发和惊喜,让我们开卷阅读吧。

目 录

序	韩 昇	1
绪论		1
第一节 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		1
第二节 基本史料价值述略		20
第三节 士族及其相关概念的省思		31
第四节 研究的旨趣与目标		36
第一章 汉魏时代的河内司马氏		39
第一节 两汉时代的河内郡与司马氏家族的文化转向		41
第二节 乡里秩序中的河内司马氏		48
第三节 司马懿在曹魏政权中的权势网络		62
第二章 魏晋嬗代史事考辨		88
第一节 高平陵之变发微		89
第二节 司马师功业考		114
第三节 谁是司马氏的敌人：淮南三叛再研究		124
第四节 伐蜀之役与司马氏集团内部的矛盾		133
第三章 司马氏集团的形成、特质与矛盾衍生		154
第一节 从魏臣到晋臣：司马氏集团的凝聚		155

2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第二节	曹魏官僚阶层的政治心态：以司马孚、陈泰为例·····	170
第三节	司马氏集团的权力结构与矛盾衍生·····	184
第四节	受成之主：泰始年间的政治特质·····	196

第四章 武帝与西晋政治的转折····· 213

第一节	咸宁二年：不起眼的转折之年·····	213
第二节	齐王攸问题的再检讨·····	233
第三节	走向崩溃：晋武帝的政治遗产·····	269

结语····· 290

附录：《司马芳残碑》考释——以中正成立的年代为中心····· 299

参考文献····· 312

索引····· 329

后记····· 333

绪 论

第一节 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

魏晋之际的历史演变素来不乏前贤时彦的垂注,相关论著堪称宏富,研究积累深厚。因此笔者展开学术史回溯时,以个人的耳闻目见,难免有挂一漏万之虞,且牵涉线索众多,恐难以面面俱到。由于本书主要运用政治史与家族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致力于探讨魏晋之际的政治变化以及家族网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在学术史回顾的部分,采取以问题为导向的回溯方式,主要围绕着魏晋政治史研究与“政治集团”分析范式的运用、士族政治这两个与本书主旨密切相关的问题展开讨论。笔者试图在现代学术演变的脉络下,对过去的研究方法与分析范式加以梳理,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提出自己的思考。对于确实难以涵盖其中,但与本书研究内容相关的学术成果,则在具体的论述分析中加以引证。

在现代学术框架下探讨魏晋之际的政治演变,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陈寅恪对魏晋两代统治阶级性质的分析。陈先生在1950年发表的《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对于魏晋之际的政治转折的意义做出如下的表述:“东汉儒家大族之潜势力极大,虽一时暂屈服于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故必伺隙而动,以恢复其旧有之地位。河内司马氏,虽即承曹叡之庸弱,渐握政权,至杀曹爽以后,父子兄弟相继秉政,不及二十年,遂成帝业。”^①

^① 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一文最初发表在《岭南学报》第11卷第1期,1950年12月,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44页。

1956年发表的《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从分析魏末士人热衷讨论的才性离合问题入手,见微知著,认为这一玄学问题探讨的背后反映的实质是曹氏、司马氏两党的政治纷争,并再次指出魏为东汉内廷宦宦阶级之代表,晋为外廷士大夫之代表,则魏、晋之兴亡嬗递乃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① 陈先生的观点主要涵盖了以下几个层面:首先,必须要在东汉末年士人与宦官斗争的延长线上来考虑魏晋之际的政治变化;其次,魏晋嬗代并不是一次单纯的易姓革命,其背后的实质是两个不同性质统治阶级之间的更替,西晋立国之后所施行的孝治天下、封建五等等措施皆反映出西晋政权的儒家特质;其三,魏末政治的实质是曹、马两党的斗争。

陈寅恪以阶级升降、政治集团等概念工具来解释魏晋两代的政权交替,将魏晋之际政治、社会、文化诸面向的变化整合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中加以阐释,指出魏晋两代的根本性变化在于:由于其统治阶级出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受不同的文化熏习,因而也奉行不同的治国方略,而这渊源自汉末的两大对立政治势力的兴替构成魏晋政治的基本底色。这一假说奠定了在现代学术意义上研究魏晋嬗代的基础,对于后续研究实有发凡起例的意义,可以说此后关于魏晋之际历史的研究大都笼罩在陈先生提出的分析框架之中。

其后,在此问题上加以推进的是陈寅恪的学生万绳楠,其在1964年发表的《曹魏政治派别及其升降》一文中指出曹魏政权中存在着汝颖、谯沛两个政治集团,曹魏政权主要依靠了汝颖的旧世族和谯沛的新官僚,汝颖集团标榜儒学,主要担任文职;谯沛集团则以武风见称,主要担任武职。

① 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最初发表在《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第47—54页。另陈寅恪先生1945年发表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其实已初步谈到这一问题,指出当时诸人名教与自然主张之互异即是自身政治立场之不同,但限于论文主旨未作进一步的阐发,见《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03—204页。而几乎同时,唐长孺的多篇论文也涉及到了清谈、玄学、才性论争这些文化论题背后的政治分歧,参读《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清谈与清议》、《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皆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289—350页。

汝颖集团通过在储位之争中支持曹丕,取得了对淮南集团的优势;高平陵之变的实质是汝颖集团与淮南集团的决战,最终以司马氏为代表的汝颖集团取得了胜利,控制了曹魏政权,为魏晋嬗代奠定了基础。^① 尽管柳春新曾经对汝颖集团这一概念的边界加以修正,^②而黄炽霖则通过对曹魏官员出身籍贯的统计,对万绳楠的假说提出质疑,认为汝颖士人直至魏明帝时代方在朝中占据优势,但以上二位所论仍大体沿用万绳楠所设定的分析框架。^③ 直至当下,汝颖集团、淮南集团依然是大陆学界在研究曹魏政治时广泛使用的概念。

万绳楠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对陈寅恪先生的学说进行了拓展。首先在研究的时间段上,万绳楠主要论述了曹魏中前期的政治史。由于陈寅恪前述的论文侧重分析曹魏后期曹、马之争的性质,而未及对曹魏中前期政治问题加以考述,万绳楠则通过对汝颖、淮南这两个政治集团的构拟弥补了陈寅恪东汉末年士人与宦官斗争一直延续到晋初这一假说在时间链条上的缺环。其次,万绳楠在检讨汝颖、淮南这两个政治集团不同的特质时,引入了地域这一陈寅恪所惯用的分析维度。陈寅恪主要以社会阶层、文化熏习及取士标准来区分曹、马两党,而万绳楠则强调两个政治集团的地域特征,并且指出汝颖多任文职、淮南多为武人这一文武分途的特征。^④ 田余庆也受到陈寅恪论述的启发,指出曹操与袁绍之争的性质在社会地位上是两个阶层之争,在意识形态上是儒法之争。不同的是田先生认为曹魏政权的世家大族化在曹操晚年便已开始,不必等到河内司马氏的兴起,并不赞成陈寅恪以儒法之争来解释魏晋之际的

① 万绳楠:《曹魏政治派别及其升降》,《历史教学》1964年第1期,第2—11页,后修订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78—92页。

② 柳春新认为曹操政权中的汝南士人很少,应将汝颖集团修正为颍川集团。参见氏著《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岳麓书社,2006年,第15—30页。

③ 黄炽霖:《曹魏时期中央政务机关之研究》,文史哲出版社,2002年,第233—241页。

④ 按地域特征以及从文武合一到文武分途都是陈寅恪论述关陇集团时所反复强调的因素,而从万绳楠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其研究受到关陇集团学说影响的一面。

历史现象。^①

尽管在 1949 年之后的很长时间内,随着大陆政治气候的变化,更多地突出对农民战争、社会经济形态等问题的研究,关于王朝统治集团的研究因与时势违碍而转入沉寂,^②学者也很难公开征引陈寅恪的研究,^③但陈寅恪的学说依然在海外的研究者中激起了相当的回响。台湾学者刘显叔在 1970 年代发表了两篇长文,综合性地讨论了东汉至晋初的政治变化,认为东汉末年的士大夫阶层内部可以划分为儒家士大夫与清流士大夫两类,清流士大夫通过交游、品题、清议等手段,在汉末形成了一种超越城乡隔阂与身份差别的清流社会。清流士大夫虽然占据了汉末政治舞台的中心,但是依然有一批恪守儒家道德规范的士人对于清流士大夫的结党浮华之风加以批判。起初在宦官势力的压迫下,两者之间的差异尚不明显,清流阵营中也包括了许多儒学礼法之士。进入三国之后,两者之间的分歧日益显著,清流士大夫受到儒家大族与法术主义专制政权的共同敌视。曹爽与司马懿之间的斗争便反映了清流名士与儒家大族之间的对

① 田余庆:《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年,第145—162页;《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版,第280—281页。胡宝国《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对于陈寅恪、田余庆两位的意见分歧亦有讨论,收入氏著《虚实之间》,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页。唐长孺虽然没有正面文字论述此问题,但其在《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一文中指出曹操的法家色彩,并提出袁曹之争代表了统治阶级内部新旧两政治集团的矛盾;在《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第25—52页)一文中又提出三国政权的上层统治者主要也是从老一代到年轻一代的大姓名士中选拔出来的,他们是构成魏晋士族的基础,其看法似乎与田余庆更为趋近。

② 尽管关于统治阶级的研究在 1949 年后不再是学术热点,但关于曹操的讨论是其中的一个例外,特别是郭沫若在 1959 年初提出为曹操翻案的问题,激起了历史学界的激烈讨论。作为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官方领导,郭沫若这一问题提出或与毛泽东对曹操的好感有直接的关联,但另一方面郭沫若提出这一问题是否在学术上受到陈寅恪看法的影响或许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毕竟郭沫若对于陈寅恪的研究有着长期的关注,其对于《再生缘》的兴趣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场讨论中,朱永嘉已从着重从儒、法对立的角度强调曹操的法家特质,见氏著《论曹操的抑制豪强及其法家思想》,收入《曹操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第365—373页。另关于这一时期大陆魏晋史研究的特点可参读何启民:《〈历史研究〉一九五四—一九六六年间有关魏晋南北朝史论文之讨论》,《政大历史学报》第13期,1996年,第1—7页。

③ 田余庆自承其 1974 年写《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一文时,虽然处于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无法征引陈寅恪的意见,但在学术上是受其启发的,见《秦汉魏晋史探微》,第161页,可见陈寅恪之论即使在特殊年代,依然对学界有着潜在的影响。

立,最终代表儒家大族力量的司马氏胜出,西晋是一个儒家大族支持建立的政权。^①刘显叔的研究显然是在陈寅恪有关曹魏是法家寒族政权、西晋是儒家大族政权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讨论,并提出修正意见,通过对士人文化身份的进一步细分,追踪汉末清议风气在魏晋政治中的延续与回响,特别关注士人内部儒家士大夫与清流名士之间的分野,指出代表儒家大族的西晋政权与汉末清流之间存有相当的距离。而卢建荣则根据曹爽、司马懿政策取向的不同,运用“变法派”与“保守派”两个概念来分析曹爽与司马懿之间的政治斗争。^②

关于晋初的政治纷争则以陈寅恪的学生徐高阮《山涛论》一文最为著名。^③徐文进一步将西晋初年的党争放在魏末曹、马之争的延长线上加以考虑,强调魏末相对抗的两股势力在晋武帝一朝不断演出了新的争衡。在晋初政治中活跃着一股以山涛、羊祜为核心的亲魏政治力量,这一名士阵线与司马氏的死党贾充等人的政治冲突,其背后的社会根源是士大夫中不同门户的对立,这构成了晋初政治分野的基本特征。^④《山涛论》是魏晋政治史研究的名篇,在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笔者大体赞成周一良对此文的评论:徐文对史料驱使之熟练与运用之巧妙使我叹服,但并不同意他的结论。^⑤晋初的政治角逐是否仅仅是魏末曹、马之争的延续,当时是否有一股亲魏的政治势力长期存在,对于徐文立论的两个关键前提,笔者皆感到怀疑。徐文一方面认为这一亲魏势力没有恢复旧朝的企图,另一方面也指出其在司马氏皇权下有着不懈竞夺政治大权的意志,这一结论却不无自相矛盾之处,如果这一亲魏势力并不以恢复旧朝为目的,那么其对

① 刘显叔:《东汉魏晋的清流士大夫与儒家大族》,《简牍学报》第5期,1977年,第213—244页;刘显叔:《论魏末政争中的党派分际》,《史学汇刊》第9期,1979年,第17—46页。

② 卢建荣:《魏晋之际的变法派及其敌对者》,《食货月刊》10卷7期,1980年,第271—292页。卢建荣的研究其实代表了另一种常见的研究取向,即运用一个较为现代的概念,如变法、保守等,作为描摹某一政治派别面貌的依据,其长处是符合现代人的思维习惯,也便于借用一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做辅助分析,但多少难免有以今格古之嫌。

③ 周一良先生以为徐高阮、汪篋、金应熙三人是陈门子弟中脑力、学力俱佳者,堪传衣钵。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收入氏著《毕竟是书生》,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48页。

④ 徐高阮:《山涛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本1分,1969年,第87—125页。

⑤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第89—90页。

于政治权力争夺背后的驱动力究竟来自何处？徐文非常强调所谓亲魏势力对魏晋嬗代中的种种丑恶现象进行批评的清议色彩，确实在晋初政治中存在着一股具有清议色彩的政治力量，对魏晋嬗代之际种种丑恶酷毒的政治手腕进行了反思，^①但若仅仅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与司马氏稍有距离，便本着“非晋即魏”的两分预设，将其划为亲魏派，恐怕不免距离历史的实相稍远。^②

进入1980年代以后，大陆学者重新开始关注魏晋政治史的研究，其中以曹文柱的论述较有代表性，其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勾勒了晋初党争的基本轮廓，认为武帝一朝主要发生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党争，党争的一方是以贾充为首的功臣集团，另一方则是西晋政治中的非主流派。^③ 王晓毅则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切入，将晋初的政治纷争归结为礼法之士与玄学名士之间的斗争，^④亦有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试图系统地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变迁。卫广来指出皇权的世俗化、士大夫的家族化、郡国的本位化是汉末分裂局面形成的关键因素，并以此为线索考述汉魏之际的政局变迁，但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仍沿用了士族与豪族对立的二分法。^⑤ 而柳春新关于汉晋时代政治史的研究，侧重于对具体政治事件的考证，例如其考订对曹魏政治走向颇为重要的“魏讽谋反案”和“青龙浮华案”的相关史实，分析过去关注不多的曹魏文帝、明帝时代的政治特征，皆别具新意，但其分析框架依旧蹈袭万绳楠的汝颍、谯沛之分，并继续沿此地域一政治集团的进路，提出曹爽集团与司马懿集团的分野在于分别代表了曹魏政权中河南士人与河北士人。^⑥

① 参阅阎步克：《西晋“清议”呼吁之简析及推论》，收入氏著《乐官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26—267页。

② 又如曹文柱将与贾充对立的—股政治势力定义为非主流派，这一命名方式无疑显示了作者难以对这一政治力量做出清晰描述的困惑，见氏著《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第44—51页。

③ 曹文柱：《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第44—51页。

④ 王晓毅：《司马炎与西晋前期玄、儒的升降》，《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第20—28页。

⑤ 卫广来：《汉魏晋皇权嬗代》，书海出版社，2002年，第6—280页。

⑥ 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第15—20、79—88、127—173页。

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史的研究具有独立的学术脉络,其对于魏晋之际历史的考察往往笼罩在时代分期论争的背景之下,其背后的理论关怀与中国学者有所不同。^①但据笔者粗浅的观察,在具体研究中,汉末清流与地方名族层结合所形成的司马氏派与忠于曹魏的反司马氏派之间的对立,也是常见的分析模式。这一分析模式肯定西晋政权的儒家特质,并倾向于将其视为六朝贵族制成立的关键因素之一。^②

应当承认以上列举的诸种研究,大体是站在陈寅恪先生相关论述的延长线上加以发展、修正,在政治立场、社会阶层、文化取向等诸面向上对魏晋政权的转移加以研究,推动了我们对于这一时代变迁基本特质的思考。但有一个弊端便是广泛使用“清流士大夫”、“名族”、“名士”、“汝颖集团”这些既没有统一认识、也难以界定的分析概念,这往往让学者有无所适从之感。^③运用政治集团这一理论工具分析政治纷争背后的阶级升降与文化变迁可以说是陈寅恪先生最擅长使用的研究范式,其对于关陇集团理论的运用便是其中的经典范例。但是随着史学研究的进展,政治集团学说的不足之处也日益显现,学界对于关陇集团的概念界定、边界设置、下限延伸等问题皆有所质疑,而正是在这一论辩的过程中,大大推进

① 参读葭森健介:《中国史における贵族制研究に关する覚书》,《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第7期,1981年,第62—83页;都筑晶子:《六朝贵族研究の现况——豪族・贵族・国家》,《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第7期,第84—110页;中村圭尔著、夏日新译:《六朝贵族制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中华书局,1993年,第359—391页。

② 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可参读葭森健介:《魏晋革命前夜の政界——曹爽政权と州大中正设置问题》,《史学杂志》95卷1期,1986年,第38—61页;伊藤敏雄:《正始の政变をめぐる一曹爽政权の人的构成を中心に》,收入野口铁郎编:《中国における乱の构图》,雄山阁,1986年,第241—269页;佐藤达郎:《曹魏文・明帝の政界と名族层の动向——陈群・司马懿を中心に》,《东洋史研究》52卷1期,1993年,第56—83页;近年活跃的渡边义浩仍强调司马氏与名士群体的关系及西晋儒教国家的特质,氏著《司马氏の台头と西晋の建国》,《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46号,2007年,第79—108页;《西晋における“儒教国家”の形成》,《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47号,2008年,第77—96页。津田资久最近对于这一二分法的研究取向提出了反思,氏著《符瑞“张掖郡玄石图”の出现と司马懿の政治的立场》,《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5期,2007年,第33—68页。

③ 关于这一问题系统的反思可参读安部聪一郎:《清流・浊流と“名士”——贵族制成立过程の研究をめぐる一》,《中国史学》第14卷,2004年,第167—186页。

了我们对北周隋唐之际历史变迁的认识。^①如果我们沿着学界探讨关陇集团概念的思路反观魏晋之际政治史研究的现状,可以发现运用政治集团学说所具有的利弊在这一时段的研究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政治集团学说是分析古代高层政治斗争一个简便而有效的分析工具,通过区分政治群体不同的出身、地域、血缘关系以及利益结合程度,勾勒出互相对立的政治集团的轮廓,借此我们可以较为便利地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记载中整理出清晰的线索,收到化繁为简的效果。^②尤其是陈寅恪先生本人的研究往往能够抉出不同政治纷争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将政治史的论述置于社会、文化变革的宏大背景中加以展示,发矇阐幽,引人入胜。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过于明晰的历史叙事往往会遮蔽掉很多演进过程中的复杂断面,特别是对魏晋之际这一充满动荡与变革的时代而言,我们在使用一些概念工具时更需小心谨慎。^③

陈寅恪对于魏晋政权转换的认识虽然发表于1950年代,但应当已经思考酝酿相当长的时间。^④相关论述就篇幅而论在陈寅恪先生的论著中

① 对此问题贡献最大的当属黄永年的一系列论文如《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说李武政权》等,主要收入他的论文集《文史探微》一书中,中华书局,2000年;韩昇在《隋文帝传》中通过对隋文帝用人政策变化的研究,详细探讨了关陇集团在隋代开始动摇、瓦解的趋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56—289页;综合性的评论可参读雷艳红:《陈寅恪“关陇集团”说评析》,《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72—79页。

② 甘怀真《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省思——以六朝隋唐为例》一文中有“陈寅恪集团理论及其影响”一节,对政治集团研究范式的得失有简要的反思,收入《中国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四届讨论会》第1册,台北,1998年,第497—499页。

③ 内藤湖南关于历史时期党争性质变化的观察值得重视,其指出宋以前的朋党是以血缘、姻亲关系为基础的,不涉及具体的政见,而以支持某种政治主张为基础凝聚成型的派系则是在宋以后才出现的,见氏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中华书局,1992年,第15页。那么政治集团这样从现代政治中抽离出的概念,在唐以前如何界定运用,是否有效,值得进一步思考。

④ 陈寅恪1945年发表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一文中即已谈到此问题,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已反映出陈寅恪对魏晋之际的诸种变化有着系统的看法,而该书主要根据万绳楠1947—1948年在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听课的笔记整理的,黄山书社,1987年,第13—22页。学界通常认为1950年代以后,陈寅恪受时势刺激,其研究兴趣已逐步转向发掘明清之际的“心史”(余英时:《试述陈寅恪史学三变》,收入氏著《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453—492页),那么可以认为他对于魏晋易代问题的看法在1949年前已基本成型。